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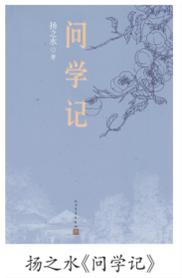


# 走向春天

卫建民



郭志刚/章无忌《孙犁传》



杨之水《问学记》

困守贫瘠的土地,生存半径跨不出自家的几亩承包地,他们的文学梦想说不定就在原地破碎了。闯入城市后,睁眼看见城乡之间存在的反差,劳动过程的亲身感受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文学想象力,乡下人的梦在大城市实现了。通过读这些兄弟姐妹的书,我认识到,他们本来具备创作的天赋,只是被生活的压力遮蔽了自己的天赋,一旦从繁重的劳动中脱身,他们就要在纸上尽情歌唱。

今年,朋友杨之水出版了她的《问学记》,特别嘱我读后谈点个人意见。我和她认识三十多年,主要是从书本中和她经常“见面”,对她个人的生活情况和经历知之不多。她从事名物研究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《诗集名物新证》,我当年收到赠书后就认真读过,还勉力写了一篇书评。《问学记》记她四五十岁时在王府井书店门口读连环画,参加工作后疯狂买书读书,在动荡岁月里坚持走一条自学的路,自己寻找精神的食粮。书中的代序是她的学术自传,也是时代的写真。她的天分、毅力和经历证明,成才的道路不仅仅只有一条。问学,既问学于书,也问

学于人。在《读书》杂志当编辑时,因工作的关系,她认识许多硕学大儒,受到传统文化熏陶,在与老前辈的日常交往中学到了书本中没有的东西。《问学记》中篇幅较长的是记徐梵澄先生。对于这位年轻时就和鲁迅先生相亲近,中途赴德留学,后去印度修道的奇人,杨之水以日记的形式记下徐先生的言行、风度,让读者看到一位活在自己世界里的高人是多么可爱。杨之水的书法,有晋唐小楷的神韵,她主动帮徐先生誊抄诗稿,聪明人用笨办法,这是最切近的问学。两代学者的交往,徐先生对杨之水的器重、欣赏,读起来真使人快乐。《问学记》里悼念语言学家杨成凯的文章,是杨之水少有的记伤逝的悲怆文字。朋友介绍她认识杨成凯后,她惊异于杨的天才,知道杨在数学、象棋、版本校雠等方面无所不精,“可同时与十人对盲棋”。自从两人相识后,他们每周在琉璃厂的古籍书店碰头,“旧学商量加邃密”,她在古色古香的氛围里问学于杨,闲谈中学习版本知识,听杨讲他对词学的认识。《应折柔条过千尺——送别杨成凯》开头写道:“一夜不能成眠。二十多年交往,点点滴滴,漫无次序乱絮一般堆叠在眼前。不是骤然的瞬间之憾,而是缓缓的浸蚀之痛。”这种对朋友逝世的追悼之文,就是“欲哭无泪”的深度悲伤。

住在医院里,朋友告诉我北京师范大学郭志刚教授逝世,享年91岁。郭先生在当代文学的教材编写和教学上的贡献,我略知一二;他在孙犁研究上的建树,我知之甚详。我和郭先生没有直接交往,只是他的《孙犁传》的读者之一,曾听孙犁老人谈起过他的写作情况。读到北师大发的讣告后,我请郭先生的学生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院的杨联芬教授代我送一挽联,我写的主要是郭先生在孙犁研究方面的成就:“耕堂对话存信史/书传审慎谱犁歌。”为研究孙犁的作品和文学道路,郭先生曾和孙犁有一场对话。这篇对话是孙犁研究的重要史料,也透露出郭先生研究路径的消息。当“晚年孙犁”初露端倪时,在中国的大学里举起研究孙犁的大旗,并培养几代研究孙犁的后起之秀,郭志刚先生应是第一人。如今,薪尽火传,孙犁研究已经在全国不少大学展开,每年都有一百多篇专题论文发表。

看天气预报,昨晚的温度是零下7摄氏度。我在年末住进医院,就像一辆汽车进修理厂大修一样,目的还是为了明年的安全生产,多拉快跑。冬天,在我心中从来就没有萧瑟感,因为我知道:贞下起元,往而必复,春天正在前面等着我。

写于2024年12月5日

题图摄影:刘明辉

老人坐下来,掏出白沙烟点上。烟雾弥漫开来,漫过脸上刀刻般的皱纹,往身后的树上飘去。那是一棵茂密的榿树,留下满地浓荫,正好供人乘凉。榿树结果,本地人谓之诺丽果,拳头大小,黄绿色,表面颗粒状,据说食用这种热带水果好处颇多。树下摆了长条桌,几把鲜艳的塑料椅,一圈人围着老人坐下。桌面凌乱散落着小孩零食、香烟、水杯。老人坐到木长椅上,拿保温杯往玻璃茶杯里倒水。茶水浑浊,黄褐色,打听才知是咖啡混合了茶叶。我知晓海南农民每天素有饮咖啡的习惯,就如内地人喝茶,但老人这种混搭喝法,我还是第一次见,委实新奇。有人问咖啡加茶影响睡眠吗?老人呵呵一乐,说别人喝咖啡睡不着,我是每晚不喝咖啡就睡不着。

老人叫冯明芳,今年60岁,是永兴岛第一个落户的居民。1989年,他随母亲迁户,在此落地生根。那时这位25岁的万宁港北青年身材挺拔,脚下虎头生风,未承想往后余生都将和这个小岛紧密相连。母亲当时是鸟粪公司职工,隶属海南供销社。永兴岛是众多鸟类的栖息地,鸟粪富含磷,是上等肥料,非常抢手,远销广东番禺、中山等地,当时需要批指标才能购买。1957年,冯明芳母亲上岛,这个家庭与小岛的因缘就此拉开序幕。

眼前的老人头发灰白,清瘦,肤色黧黑,一张标准的渔民脸。虽上岛只短短几日,我也能辨识出渔民与其他人的区别。长年出海捕鱼,黧黑的皮肤就是他们鲜明的职业标志。老人深吸一口气烟,往长椅上靠,咧嘴一笑,脸上的皱纹骤然化开,往事如烟,话匣子就此打开。即使已至花甲之年,老人依然坚持每周出海捕鱼。从永兴岛出发,开出十几海里后,七连屿,赵述岛早已在视野里消失。放眼望去,碧波滔天,大海无边,渔船缩成洪荒宇宙间的小黑点。渔船是2005年买的,玻璃钢结构,7米长,当时花了两万多元。对渔民而言,船就是家,家就是船。这条小渔船伴随老人多年,早已成了他最为信任的伙伴。选一处风平浪静的海域,停船,下网,坐等其成。渔获好时,一网能收获一百多斤。休渔期不能出海,手痒难耐,便挥竿钓鱼,运气好时,能连竿钓上鞍带石斑、马鲛鱼、长吻鼻鱼、黄斑胡椒鲷。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鱼,统称杂鱼。杂鱼煲是海南一道名菜,选各类小鱼,垫五花肉丝,加姜葱蒜,淋上酱醋,文火慢炖,香气扑鼻,肉质鲜美,入口即化。

这无风的午后,阳光猛烈,炙烤万物,仿佛能嗅到老人皮肤褶皱中散发出的海洋气息。那是长年与海洋鱼类打交道烙印,早已融入肌肤。我们渴望听到一则海明威式“老人与海”的故事。老人抿嘴一笑,说起了遭遇鲸群的往事。几十头鲸鱼排山倒海一般游来。海面不时响起一阵阵啊——呜呜的巨响。呜呜的声音拉得很长,像鲸鱼的高歌,余音绕梁,传去数里远。那时老人刚撒下渔网,鲸群游得很快,已经来不及收网。小渔船一阵抖动,鲸鱼绕开渔网,从船底钻过,转眼消失于茫茫大海中,一切像梦境一样。这么壮观的鲸群,他也只见过一回,后来再也未遇见过。

老人回忆起当年上岛时的情形,依然忍不住摇头叹息。那时岛上条件之艰辛超乎想象。上世纪90年代,全岛不通水电,饮用水主要靠雨水接济。一旦下雨,所有坛罐盆都用上,水蓄进池子里,供日常生活。时间一久,池底生满青苔、跳虫,不忍卒视。即使如此,那也是岛上唯一的淡水来源,弥足珍贵。补给船通常两个月才来一次,遇上台风和恶劣天气,时间更久。长时间没有蔬菜、水果,身体缺少必要的维生素,每个人都患有严重的便秘。如今无线网络覆盖永兴岛上每个角落。海水淡化厂四台机组马力全开,每天能提供一千吨生活用水,足以保证全岛日常生活用水。

渔民信奉传统,不带女眷上岛,家属都生活在几百公里外的陆地上。岛上面积仅3平方公里,绕岛一圈也不过个把钟



老人与海 郝朋

头。除了捕鱼,平常的生活异常单调枯燥。岛上没有通讯,与外界几无联系。永兴岛直到2003年才开通40门无线电话,与外界的联系逐渐正常化。出海捕鱼,最怕遇到恶劣天气。人之于大海,如沧海一粟。老人提起当年遭遇过的龙吸水,依然心有余悸。龙吸水,又叫水龙卷,是一种罕见的自然现象。看上去像一条从海面升起的巨大水柱,连接着天空中的雷雨云,就像一条神龙在吸水一样。龙吸水破坏力极强,伴随着高速旋转的漏斗状云柱的强风涡旋,能轻易吹翻船只,船毁人亡,渔民谈起龙吸水都会为之色变。老人回忆最危险的一次,船翻了,所有人都落了水,万幸的是附近正巧有船只路过,搭救了他们。

老人烟瘾大,烟雾缭绕,漫过头顶,与正午闷热饱满的热带气息融为一体。“都熬过来了。”老人大手一挥,似乎要与过去的一切挥手告别。对于眼下的生活,老人显然非常满意。现在岛上的渔民大多栖居于北京一横路上,原籍以万宁、琼海一带的渔民为主。以前渔民上岛,住的是自己搭建的帐篷或活动板房,在台面前不堪一击。2006年,南村与北村申请合并,成立村委会,2009年获准复批,2013年正式更名为社区。老人一年大概有300天在岛上生活,老伴儿则留守万宁老家。政府给落户的每家每户都建有独栋的房子,面积按人头算,70平方米到120平方米不等,每年象征性收取1元的房租。老人的房子一共二层,楼下的门店作小卖店,由儿子、儿媳料理,销售一些日常生活用品。岛上的所有商店都没安装门窗,24小时敞开,真正意义上的夜不闭户。现在岛上生活用水早已不成问题,政府给全岛居民免费供给。

除了捕鱼,老人业余生活最大的爱好是养蜂。岛上植被茂密,花草种类繁多,很适合养蜂。老人指了指二楼的露台,上面养了10多箱蜜蜂。去年丰收,收割了几十斤蜂蜜。那是纯天然的花蜜,1斤能卖200多元。3岁的孙子趴在老人肩头,静静地听爷爷讲述故事。作为岛上最年轻的一代人,祖辈们的故事对他来说过于遥远。如今老人儿孙绕膝,生活美满,随着年龄的递增,出海捕鱼次数日渐减少。这片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祖宗海,像一位慷慨的母亲,无私地哺育着无数后人。

风从南海深处刮来,吹得榿树叶窸窣作响,我们手捧冰镇椰子,啜溜一口,抵挡让人昏昏欲睡的赤热。依稀听见老人说,风平浪静的好天气,出海能经常看见成群的海豚。这些通人性的海洋精灵,不断在船头方向高高跃起,脊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就像一群渔民的守护神。

精巧的造型、精准的走时,一提到手表,天津人首先想到“海鸥”牌手表。作为第一批中华老字号和津门老字号,海鸥手表承载了几代国人的情感记忆,更见证了天津乃至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壮大。

近代以来,以制表业为代表的手表工业蓬勃发展,但以欧美品牌为主的国外手表充斥中国市场,中国本土手表制造业没有一席之地。新中国成立后,中国制造业自力更生、奋起直追,在这样的背景下,国产手表应运而生。

天津手表厂是中国钟表工业的重要代表,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54年。当时,由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领导,公私合营华威钟表厂、华北钟表厂和私商怡威钟表厂共同合作,成立了国产手表试制

为中国手表工业的发展奠定基础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天津手表厂不仅生产了“东风”牌机械手表,还成功研制出符合国际标准的“海鸥”女表,并获得国家银质奖。在天津手表厂的早期发展史上,经历了从仿制到自主创新的转变。其中,ST5机芯是中国第一款自主研发设计的手表机芯,直径27mm、厚度3.8mm,走时44小时,该机芯走时精度高,性能良好,且基本实现了机芯零件的自主生产,并且出口海外,装配该机芯的“东风牌”手表于1969年投产,1978年年产量达120万只。由于其质量精良和自主设计的特点,ST5机芯得到了较快发展,同时也开启了天津手表厂自主研发更多升级机芯的序幕。改革开放后,天津手表厂逐步转型,推出多款自主设计的手表机芯,在ST6的基础上设计出ST11等系列机芯手表,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定的认可。经过几十年的奋斗,天津手表厂已发展为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,现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精密机械手表机芯制造基地,机芯年生产能力300万只,形成11个系列、200余个品种;成品表年生产能力20万只,形成6大系列。

从第一块诞生之日起,海鸥手表就没有间断研发的脚步,目前已拥有完整的机芯生产线,包括自动上链、手动上链、复杂功能机芯,其机芯性能稳定、精度高,部分高端型号机芯达到了瑞士天文台认证标准,展现出中国制表业的顶尖技术水平。经过60多年的研发积累,海鸥手表掌握了代表国际手表制造顶尖水平的双陀飞轮、万年历表、问表等超复杂机芯的自主知识产权,填补了中国制表业空白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,海鸥手表的产品线也随之变得更加丰富多样,涵盖经典、复古、时尚、运动等多种风格,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。海鸥手表在国内市场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,同时也积极拓展国际市场,受到世界多国钟表爱好者的关注,收获好评。作为老字号企业,近年来海鸥表业紧跟时代潮流,闯入电商销售、专场直播、跨界合作生产联名腕表等新赛道,传统制表工艺与年轻时尚潮流碰撞交融,以赢得更广阔的新兴消费群体。

## 津派文化与近代化(五)

# 海鸥闪耀“国货之光”

杨军

组,即天津手表厂前身,这也是海鸥品牌的起源。1955年,试制组选择仿制结构相对简单,适合当时工业水平的苏联制“SINAGO”牌15钻三针粗机手表。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,在4位有经验的老师傅全力以赴的拼搏下,终于在当年3月24日,中国第一款国产机械手表——“五星”牌手表试制成功,结束了中国“只能修表,不能造表”的历史,开启了中国制表工业的传奇历程。首次试制成功后,试制组根据经验制定了《手表试制计划草案》,并决定在第一次试制的基础上提高标准,制造细机表,最终选择以瑞士“TITUS”(铁达时)牌17钻细机防水表作为仿制对象。此后,随着技术的不断提升和设备的引进,国产手表逐渐进入量产阶段。

1957年4月,天津手表厂在“五星表”核心技术基础上,推出“五一”牌手表,到1958年10月,“五一表”已形成批量生产规模,

## 沽上丛话

一代艺术宗师李叔同(1880—1942)才艺卓绝,早年擅书法、古诗词、通丹青、达音律、精金石、善演艺著称于世。然而,38岁那年,他挣脱世俗羁绊,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剃度,从此潜心向佛,法名演音,法号弘一,最终成为一代高僧,被奉尊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。

李叔同17岁师从津门唐静岩学习书法篆刻,1914年加入西泠印社,一生治印赏印论印,识见独到。他自创锥刀刻印,宗法秦汉,由书入印,冲淡典雅,简约率真,讲究布局,排列严整,显现出非凡的生活情趣、人生襟怀和艺术追求。

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,李叔同正式皈依佛门前,将自己多年来悉心收藏的94方自用印章全部赠给西泠印社。为保存这些珍贵印章,印社在孤山山麓鸿雪径的崖壁上凿窟,将印章装入木匣,封存于洞内度藏,洞口外覆盖一块碣石,高9寸,宽1尺,并镌刻由叶为铭(西泠印社)“创社四贤”之一,字品三,号叶舟)题写的阴文小篆“印藏”二字,左侧题跋6行隶书,记述缘由:“同社李君叔同,将祝发入山,出其印章,移借社中。同人用昔人诗家,书藏遗意,凿壁度藏,庶与湖山并永云尔。戊午夏,叶舟识。”意指“印藏”是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前留给尘世的雪泥鸿爪,亦高度契合苏轼“人生到处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”的诗意。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,青苔覆满石壁,“印藏”成为鲜为人知的秘密。

1963年秋,西泠印社建社60周年紀念大会前夕,因担忧“印藏”壁龛年久淤积,印社决定开启“印藏”,另予珍藏。于是,撬开了封闭45年之久的石碑,取出木盒,李叔同的印章得以重现于世,时隔半个世纪,它们仍清晰完好。那块“印藏”刻石,如今依旧嵌于原处,供游人观瞻缅怀。

李叔同幼名成蹊,学名文涛,字叔同,号漱筒,一生曾使用李息霜、李哀、李息翁、李岸、李婴、欣欣道人等40多个名字。综观这94枚印章,印面文字多为李叔同的姓氏、别号、斋号,边款内容别样丰富,隐含众多故人往事,见证了其与印友们的金石交往和真挚情谊。印材质地多为寿山石,刻制时间大致在1899年至1917年之间,大部分为1912年至1917年所作。除李叔同自镌的一枚“文涛长寿”白文印外,其他作者主要由三类人员构成。

一是王福庵,叶为铭等9位西泠印社社员(含李叔同)的18方印章。王福庵是“创社四贤”之一,1913年刻“息老人”寿山石方印,边款“福盒刻,充袁公文房。癸丑五月”。叶为铭所刻“一息尚存”寿山石方印,上有兽钮;边款“叔同书家所用之印,今藏印社。戊午五月叶舟识”,系1918年西泠印社保存“印藏”前补刻。此外,印社社员费



九如图(中国画)

杨志芳

## 登高新韵

王福海

江河湖海波光秀,日月星辰满眼收。壁峭关城多壮丽,词承诗赋尽风流。新生九域添华彩,老骥倾心作阵头。残卷山居圆破镜,万邦屹立向神州。

(注:残卷,特指元代画家黄公望于1350年创作的纸本水墨画《富春山居图》,被誉为画中之“兰亭”,属国宝级文物。此画几经易手,并因“焚画殉葬”而身首两段。前段《剩山图》现藏浙江省博物馆,后段《无用师卷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2011年6月,《富春山居图》全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首度“合璧”展出。)

# 李叔同赠印西泠印社

周惠斌



龙丁刻“李叔同”寿山石方印,边款“息翁属龙丁制于西泠”;另有胡然刻“但吹竽”、经亨颐刻“李布衣”、王世刻“息翁大利”等。

二是李叔同一生不同时期的好友徐新周、陈师曾、友朋云、丁二仲、吴在等书画篆刻家的29方印章,反映了他与朋友们艺术往来中的交谊。吴昌硕的篆刻弟子徐新周(年长李叔同27岁,二人为忘年之交)刻有6方印,包括1899年的“漱筒长寿”朱文印,1904年的“广平”朱文印、“三郎沉醉打球回”白文印,1912年的“息霜”白文印、“息翁”朱文印,以及“李布衣”朱白间文印。书画家陈师曾(史学巨擘陈寅恪的兄长)刻有5方印,印文分别为“叔子”“前世画师”“李布衣”“李息之印”“息翁晚年之作”,其中“前世画师”取自苏轼诗句“前世画师今姓李”。友朋云的“当湖惜墨”印,曾钤盖于天津博物馆藏李叔同1899年苏体行书《王次回

平江孝仪看灯词》上。丁二仲刻有3方印,分别为“管领湖山”朱文印、“丙辰息翁归寂之年”白文印、“放浪”朱文印。吴在1912年刻有两方印:“李息”白文印,边款“吴在应李息命,壬子六月”;“李布衣”白文印,边款“叔同命吴在刻,壬子六月三日。叔同以徐星周、陈师曾所刻李布衣三字印见视,且出此石篆刻,余率应之,愧陈多矣,在记”。

三是“乐石社”社友的赠印。1914年,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生成立金石篆刻研究会“乐石社”,李叔同任首任社长,邱志莹任书记,夏丐尊和12名学生社友先后刻47方赠李叔同。1913年,夏丐尊刻“哀翁”朱文印,边款“息霜丧母以后,更名曰‘哀’,有孝思焉。余年前失恃,余痛未已,今刻此印益增凄怆。癸丑四月十七夜,丐尊就火作此”。后又补款“丐公制印,息翁所藏”。同年又作“息翁”白文印,边款“此印自诩不俗,息霜解人当用之于得意书画也。癸丑十月望夜,丐翁”。还有一方“哀公”朱文、“李息”白文两面印,边款“寒夜戏以小石刻息翁名字,遂赠之,丐记”。学生陈兼善刻“丙辰息翁归寂之年”寿山石白文长方印,边款“岁次辛酉,月旅

黄钟,息翁夫子以芙蓉之产,属篆于其门人兼善。顾谓善曰:乃者子平麻衣观予相,推子命。咸曰:丙辰之岁,恐将不讳。因属汝刻此以记之,文曰‘归寂’篆用籀斯。善闻命之下,不禁悲增切怛。窃意昔者,韩王与军校同庚,孔子与周公异相,子虚之学,圣人罕言,以顺受命,以心胜形,何夫子信以为然邪?深夜危坐再三思量,乃知夫子之言别有所指,亦非佛氏之离相,寂实尼圣之乘槎浮海,夫子以为然否乎?善将负笈以从夫子游。乙卯,受业陈兼善谨记于虎林师校,落一‘灭’字”。记述了印面内容的由来,即师生的亲密交往、情感交流和深厚情谊,以及对李叔同的尊崇之情。

印藏西泠,湖山并永。“印藏”艺术地反映了李叔同早年与金石朋友圈的交往酬唱,再现了他与“百年名社”西泠印社红尘结缘的过往。鉴赏这些遗世“印藏”,不仅可以真切领略西泠印社早期社员、篆刻名家、“乐石社”师生铁笔刻赠印章的各式面貌及其艺术之美,而且能够充分感受一代奇才李叔同的一生行谊、印人情怀、德性光辉和精神境界。